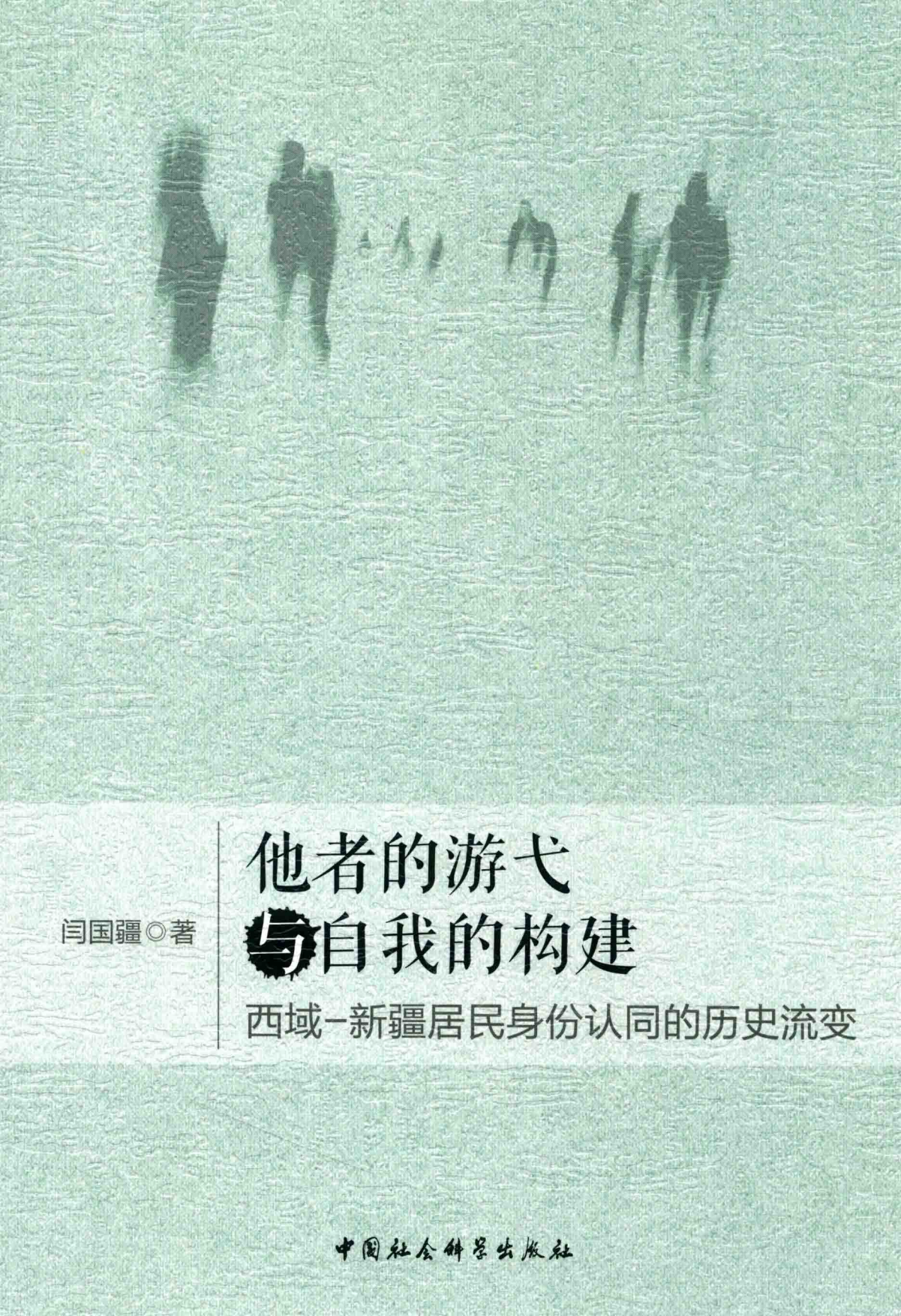




闫国疆◎著

他者的游弋 与自我的构建

西域—新疆居民身份认同的历史流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献给亲爱的父母：闫文义、李月萍 •

他者的游弋 与自我的构建

西域—新疆居民身份认同的历史流变

闫国疆◎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者的游弋与自我的构建:西域—新疆居民身份认同的历史流变/
闫国疆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61-9237-5

I. ①他… II. ①闫… III. ①居民—社会认知—历史—研究—新疆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84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379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一

中国社会转型和近年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发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暴力恐怖、极端宗教和民族分裂主义对国家统一和安全造成的威胁，需要我们对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和治疆策略、民族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等问题进行深入认真的思考。本书站在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充满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另一方面从新疆历史和社会转型发展的角度，阐释了身份认同问题对于一个由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群体构成的社会 and 现代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意义。既有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也有哲学社会学的分析，兼具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爱疆爱国的浓浓家国情怀。

作者引导我们思考新疆问题的时候，不仅梳理了历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经验与启示，而且指出了相关问题；在涉及民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等现代民族主义根源的问题时，又为我们呈现了现代西方的认同、公共记忆理论和人类学思考，显示出其对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理论的驾轻就熟的功夫和理论创新能力。作者认为“重群体而远国家”是新疆问题的根源，这可谓独到而深刻的准确诊断。基于此，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一现象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身份资本化”密不可分。要解决认同危机、消除新疆分裂的威胁，必须要从深入而全面的社会治理入手，而非单一的“民族”“宗教”或其他途径。这是一个持久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作者认为，认同危机并非一省、

一国的个别现象，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遭遇，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英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土耳其等多个国家都有类似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问题的出现就对新中国的治疆方略给予否定。

作者指出，“一带一路”规划给予新疆绝佳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的建设成败则成为中国是否真正拥有崛起大国实力的试金石。这是准确的时代判断。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绝佳机遇面前，我们不得不认清另外一个事实，即每当谈及“一带一路”时，人们总免不了忧虑“核心区”的暴恐分裂之患，而此患之成与消皆与历史有着种种纠葛。现实与历史的纠葛中，我们发现，确如法国历史学家格鲁津斯基所言，不了解过去并且“认识到我们通常对她知之甚少，那么我们就无法书写历史”。作者通过西域—新疆数千年历史流变中的居民身份考察，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清晰的客观事实：今天被称为“新疆人”的人们，是“悠久的历史中，由许多各式各样人类集团重复进行着集中及重组的同时，渐渐地融合、混合而成的结果”，宗教和民族“都是历史上的生长物。不仅会变质变形，还会消长及生灭”。宣称西域—新疆只是某一族裔或信仰群体的故土家园，既与历史不符，也与现实不合，更会酿就“重群体而远国家”的认同危机，祸国殃民。总体来看，与前文所言类似的分析和判断，书中还有还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字里行间皆可看到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浓的家国情怀。

整体看来，这是一部视角新颖、资料翔实，真正具有问题意识却无任何政治理论倾向问题的学术专著，是一部在篇幅、主题、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堪称“宏大”的优秀著作，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达到出版水平，值得出版。相信该著作的出版也将有益于治疆、治国和“一带一路”的建设。美中不足的是，著作部分内容表述稍嫌哲学化，可能会给部分读者带来一些阅读困难；有些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的对策和路径等，希望作者继续研究，再奉佳作，为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贡献力量。

前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姚润皋

序言二

此书是近年难得的真正具有问题意识的学术专著，其涉及的问题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的、亟须解决的问题。

如何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构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从来都是一个难以顺利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从原来的王朝体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其难度更是超过了一般的类似国家。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源，尤其在协调不同民族建设一个文明共同体的问题上，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思路、经验和管理方式。比如，作者从西域—新疆数千年的历史流变，特别是清朝末年至左宗棠、民国初年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历史经验中看到，新疆改制建省，实现西域—新疆与全国政体的首次统一，不仅消除了宗教分裂势力的基础，促成了天山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族裔、不同信仰居民在广泛交流与互融互动中的身份重构，而且保证了新疆在满清分崩离析、全国战乱不休的情况下，始终未酿大乱、未被分裂，为后世边疆治理与社会整合留下了宝贵经验。其中三点尤为重要：

第一，新疆的安定发展与各族人民的幸福，需要大中华格局下的强有力的政治稳定。清末新疆大乱带给人民的灾难清晰表明，无论是何种原因所致的动乱，遭殃的都是百姓。阿古柏政权动辄万人的屠杀、万户伊犁居民被沙俄强制迁移、数十万民众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与左宗棠、刘锦棠西征平叛，一路所为的收留、安置与新疆建省改制后的区域复兴的对比则昭示我们：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要发展、百姓要

幸福，都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新疆离开了祖国怀抱的庇护，必遭灾祸，与民、与区、与国皆是百害而无一利。

第二，多元文化与宽容格局的形成需要打击任何极端的主张，尤其不宜强调个性差异与特点突出的宗教与族群身份。正如左宗棠、杨增新所言，新疆地广人稀，且多元文化特点突出，不同文化、族裔和信仰群体个体需要保持并张扬个性、彰显特色，但这种张扬更需要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同一与整体下的彼此宽容和理解。在千百万不同族裔、不同信仰居民构成的社会世俗生活中，尊重不同群体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同时，必须坚持政教分离、自由有界的原则，否则极易给予不法分子造谣生事、兴风作浪的空隙和机会，甚至出现类似阿古柏强制改宗、屠杀数万不同信仰居民的悲剧。对于那些借助“宗教”“人权”之名的“所谓条勒阿浑，往往捏造邪说，肆其诱胁之术”，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高度警惕，必须牢记“人心易为摇惑，祸乱每由此起”的历史教训。

第三，近一个半世纪的新疆和近五百年的世界发展历史彰显了一个规律：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要缩小乃至拉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国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一个国家如“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它们在原有的（世界）体系框架内不可能获得任何‘公平’发展的机会”^①。数千年的历史事实则表明，无论哪个历史阶段，无论何种形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甚至名义上的忠诚（比如蒙元后期），是维护西域—新疆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无论是观察还是治理新疆，作为边疆地区的一些历史前提（自然、人文）与内地的历史评价可能需要我们认真再做重新审视。

在新疆这样的边疆地区，由于行政权力的变迁和人口的迁移从未停止，这样的历史经验就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和吸取。所以，作者以中国民族的现代意识和观念为抓手，利用历史资源，尝试用新的身份构建来逐步化解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纷争，使各族人民在中国公民的身份上达成新的认同，从而构建一个稳定、和谐和繁荣的新疆的构想，

^① 陈晓律：《社会主义实践对发展理论的贡献》，《史学集刊》2015年第5期。

是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可以为我国的边疆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也为探索新型大国的构建进行了理论上有意义的尝试。因此，该书稿是值得出版的，它的出版将有利于中国的边疆建设，也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当然，书稿也有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首先是书名嫌长，会影响中心思想的凝练；其次，语言应尽可能朴实，尽量避免一些抽象的哲学化术语，以使一般读者能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进而扩大本书观点和思想的影响力。

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平台平台长、南京大学欧洲中心主任：陈晓律

前 言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明确了各省区在国内外关注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定位及对外合作重点方向。新疆与福建分别被确定为“一带一路”的海陆两大“核心区”，让不少人大呼“意外”。其实，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完全是一种适应历史发展和时势所需的必然选择。

新疆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核心区”之所以让一些人感到“意外”，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新疆一直作为中国的“边疆”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并且，在近两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中，任何一届中央政府的文献记录里，今之新疆、古之西域均未以“核心区”的身份在国家战略规划中出现过——即便是晚清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激辩中，新疆也不过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而非建设规划的重点。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处于中央政府战略规划“边缘”地带的新疆，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大影响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怎么会成为“核心区”？这恐怕是让人们感觉“意外”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大呼“意外”的人们或许是忘了，亦或许并不清楚，与数千年历史记忆同样厚重的一个事实：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始终处于边疆地带的古之西域今之新疆^①，早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省

^① 蒙元前期除外。

级行政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是国家战略核心区域之一。将新疆作为国家 21 世纪重大战略“核心区”的规划，凸显了党和国家基于历史和当下形势判断的准确与高瞻远瞩，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当然，将新疆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区”的高度，确实属于中国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的首次。并且，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央政府将一个处于国家自然地理边缘的省区设为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核心区”也属罕见。如此历史鲜有，或曰“不按历史习惯出牌”的创新之举，确实难免有“出乎意料”之感。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实条件来看，2009 年的“7·5”事件及其后几年，暴恐事件的频现凸显了新疆部分居民“重群体而远国家”的认同危机。民族身份资本化和不法分子与敌对势力借助“宗教”“民族”和“历史”搅乱新疆的问题，已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重大隐患，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道路前行影响巨大。

毋庸置疑，如何准确认识和解决认同危机，如何抵御和防范宗教渗透与各种不良社会意识对新疆发展的负面影响，如何彻底消除敌对势力借助民族、宗教、历史与传统习俗等实施暴恐和分裂中国的危险，不仅是新疆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今日中国道路前行的重大问题。在如此现实面前，党和国家能将新疆置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核心区”，谋划现实和未来，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和边疆治理的自信和底气，而且显露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借鉴历史、远瞻未来、把握现实、运筹帷幄、治国理政的魄力和能力。

当然，未来的规划是基于历史的发展而来。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新疆经历了无数次的分裂与统一，不断整合，社会政治制度、区域文化、宗教信仰和居民的身份认同都数经变化，他者的游弋与自我的构建中不断形成新的居民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为新疆提供了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独特条件，使新疆具有其他省区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毋庸讳言，新疆近年频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以数千无辜者的死伤凸显了影响新疆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安全问题，暴露了新疆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诸多问题，其中，对“7·5”事件以及相关

问题的认识偏失，特别是传统“民族”“宗教”“历史”的褊狭视域，不仅使相关问题的处理效果低微而且遗患众多，比如，“7·5”事件之后长达10个月的封闭所带来的谣言泛滥和一定程度上的群众与政府间的互不信任，一小撮打着“民族”旗号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的极端行为和由此引发的不同族裔群体间的关系紧张、隔阂与对立，新疆“反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中的个别偏激行为引发的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误解与紧张，一些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余年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质疑和彻底否定，等等，已极大地影响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和国内外视听，影响了新疆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瑕不掩瑜。客观地讲，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方略与相关举措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在相关政策的具体执行中，由于具体工作人员的认识差别和个人工作能力的不同，实际工作中所出现的种种偏差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日渐显现，这在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尤其明显。事实上，中国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具体事务的许多政策或理论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仿效苏联而定的，时过境迁后，其中许多已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在认真总结和反思已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如何根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施以适合现实的社会治理，促使社会成员在获得良好个性发展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处理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使个人与社会、群体与国家协调一致、良性发展，这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理论分析和把握，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脉和给力，需要深入历史寻根问药。这是我们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复合方法，研究新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在对新疆已有问题做出必要反思之时，我们还需注意，当今世界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多元电子信息时代，思想活跃是其鲜明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使日常社会治理不得不更多地强调和谐共存。如何在提倡个性自由的现代化科学发展之中构建一个多元共存、美美与共的“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与此

相应，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如何应对社会发展和转型中涌现的各种问题和社会思潮，以保证个体意识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基本一致，也成为理论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

从历史来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依赖于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社会群体成员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现代社会对人的管理更多是一种意识上的引导和管理，而不是简单的身体限制控制。苏联未能很好解决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导致其在转型之时大量涌现的不同社会意识特别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对立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冲击下解体，中国必须引以为戒。

毗邻苏联所属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八国接壤，边境线长达 5600 多千米，是连接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战略要地，也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却地广人稀、发展滞后。自然环境特殊、多元文化特点明显、多种信仰特征突出的新疆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正如左宗棠所说：“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新疆相对还比较稳定和安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这种稳定和安全则难以为继。亚欧大陆桥的建成和众多边境口岸的开启，特别是苏联解体和颜色革命以后，西方从经济和政治上全方位地争夺新疆的意图更加明显。在频频作怪的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影响下，群众疏远甚至敌视国家意识形态进而形成民族和国家分裂已不再是杞人忧天。如何在应对异端和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干扰和围剿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战略性课题。

国家的安全和统一需要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支持，而人从现实性上讲，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生活于具体自然与社会环

^① 《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701 页。

境、拥有特定角色和具体身份的感性的人。公民和民族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两大身份，民族和对社会成员具有特殊同化作用的民族品性是历史发展之物，民族内的不同群体并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完全一致的性格特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群体并不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同质性。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民族识别确立了今日中国的 56 个民族，在这一现代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国家政策的理解偏差和个别错误行为的延续衍生的“扭曲的集体记忆”，导致日常生产生活中更多实施的是一种群体身份的管理，而个人自主意识不足和社会共同信仰的匮乏则给予敌对势力和不良社会意识以可乘之机。在新疆，伊斯兰教在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数十个民族中拥有众多信众，而分裂分子却多为个别族裔群体而非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并且“7·5”事件的参与者除了青壮年之外还有不少孩提少年。这一事实说明，新疆的问题绝不是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宗教信仰不同所致”，也不是简单的“民族团结”问题。

为了国家安全和新疆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社会矛盾问题。如何通过有效的记忆重塑和身份重构，纠正已为人熟知的错误身份意识与社会认同，使社会成员在更加全面的发展中，完成从自然、自在，走向自觉、自由的个体身份转换，使众多社会个体在充分表达自身特点的同时，明确自己的身份所属，自觉形成其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从而彻底消除敌对势力借助“民族”或“宗教”问题分裂中国的威胁，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笔者著本书的重要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普遍联系的世界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定历史条件。今天，不仅是解决新疆问题，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都需要稳定统一的和平环境，这种环境的获得需要“内外兼修”。

进入 21 世纪以后，日渐深入的经济全球化与高科技媒体革命，更加深化和加强了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带来了世人对世界政治经济模式等诸多看法的巨大改变，各国更加注重自身形象塑造

并以此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为自己谋求更好的存在与发展。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梦”到“一带一路”，中国政府已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发出了携手共建人类美好明天的呼吁。但是，受到历史成见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呼吁在世界的回应不尽相同。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西方国家爱恨交织，它们眼中的中国色彩复杂、褒贬不一。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从最初“封闭”“独裁”“好战”“输出革命”的“红色恐怖”到“开放”“专制”“果断”“具有侵略性”的“经济动物”，再到今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色彩斑斓”的“崛起大国”形象，几经起伏之后，中国在持续高效的良性社会发展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赞同。

伴随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而至的众多问题，特别是身份认同与国家安全问题，需要中国认真反思和正确处理社会存在的不同矛盾。面对社会发展中日渐拉大的群体与地区差距，以及西方世界频频借助“人权”攻击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理性反思和认真总结自己在建设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取决于“核心区”建设的状况，可谓“成也新疆败也新疆”。面对借助“民族”“宗教”频频破坏新疆稳定发展的“三股势力”，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国际“反恐”行动，以更加有效的国家治理和更好的社会建设来推进和平、发展、合作事业，向世人展示自己维护和平、注重人权、关爱民生、担当责任的良好国际形象，并以此获得更多更好的国内国际身份认同，谋得社会更快更好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保证。

总而言之，无论从国际与国内的角度，还是从现实与未来的纬度来看，正确认识和解决新疆这一中国重大战略规划“核心区”的现实问题，都必须从历史的考察入手。“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要解决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的愿景规划等中国社会的理想性存在与现实性存在间的矛盾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历史，寻根问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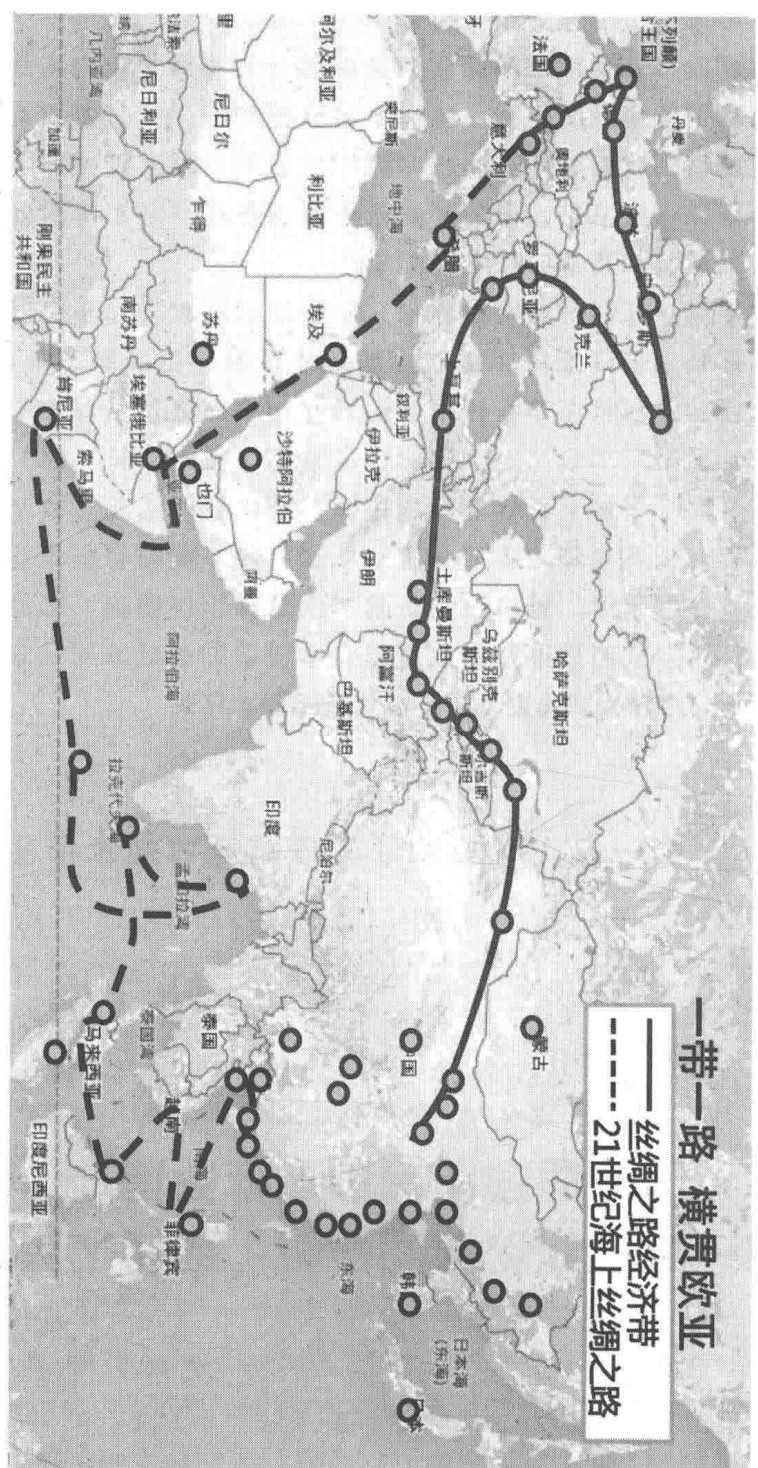


图 0-3 “一带一路”线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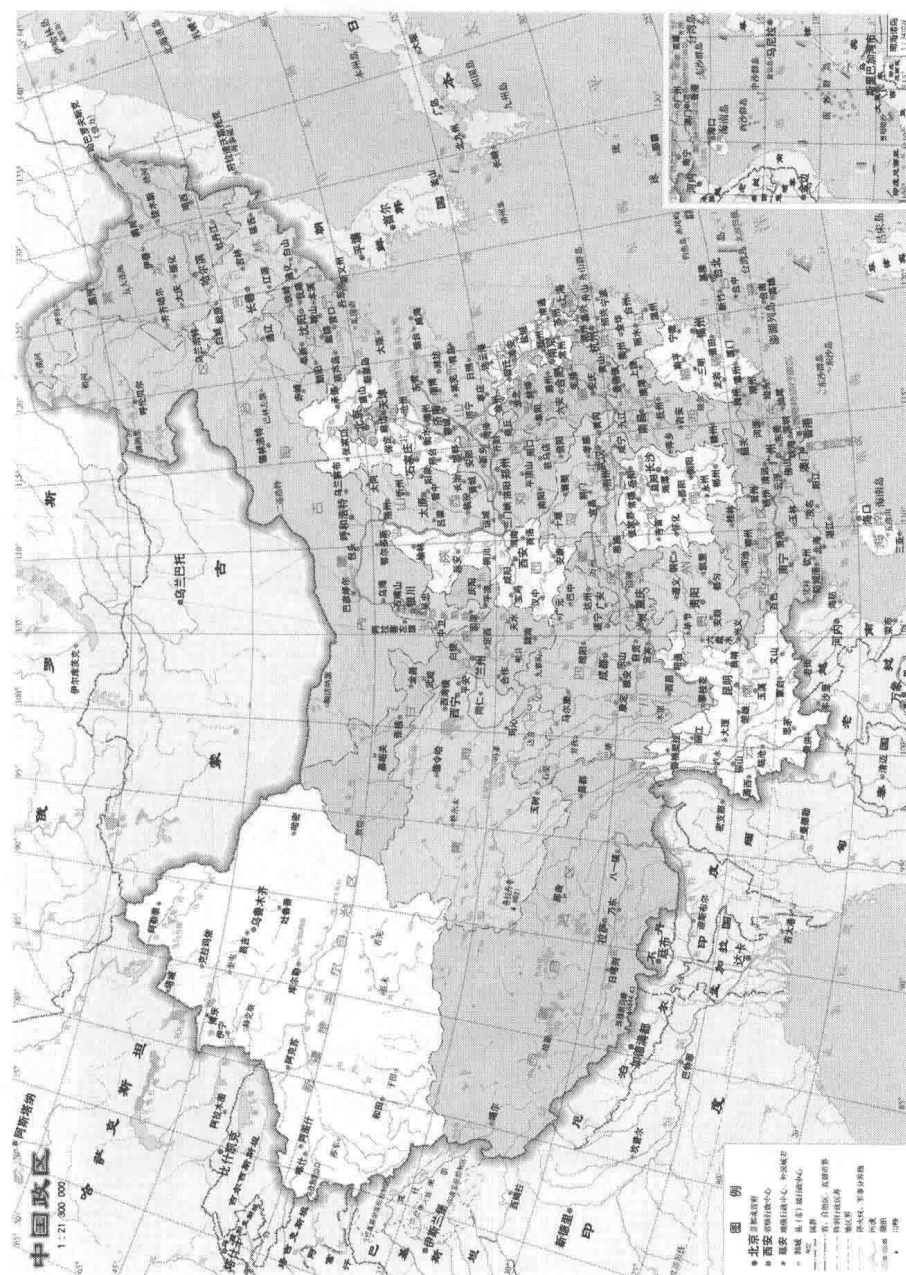


图 0-1 新疆在中国行政区域中的位置

